

第二届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论文集

研究与交流

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
长沙市博物馆



中央文献出版社

研究 与 交 流

第二届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论文集

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 编
长 沙 市 博 物 馆

主 编 王立华 夏佑新
副 主 编 魏 明 李历松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研究与交流：第二届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论文集/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长沙市博物馆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12

ISBN 978-7-5073-1819-7

I. 研… II. ①全…②长… III. ①毛泽东 (1893 ~ 1976) 一生平事迹②毛泽东纪念堂—文集 IV. A752 G268. 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5726 号

研究与交流——第二届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论文集

主 编 / 王立华 夏佑新

责任编辑 / 李庆田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 100017

经 销 / 新华书店

排 版 / 北京方方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 / 北京毕诚印刷厂

787 × 1092mm 16 开 15.25 印张 230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100 册

ISBN 978-7-5073-1819-7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湘潭大学 王向清 (1)
毛泽东在北大红楼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刘 静 (14)
伟人之家	
——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暨毛泽东杨开慧故居	周 英 李历松 (22)
在纪念八七会址 80 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八七会址纪念馆 (30)
毛泽东与井冈山时期的经济斗争策略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饶道良 (33)
论安源和安源工人为创建新型人民军队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纪念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80 周年 ...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黄 仿 (42)
二十世纪初教育界的曙光	
——湖南自修大学	长沙市博物馆 齐建芬 (49)
毛泽东与八七会议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崔利民 (59)
毛泽东在中共三大前后对农民问题的探索及理论意义	
..... 广州农讲所纪念馆、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	荆永才 黄志坚 (66)
毛泽东与武昌农讲所	武汉市革命博物馆研究馆员 周 斌 (72)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十一次宁都之行	
..... 宁都县博物馆	龚远生 王检生 (80)
毛泽东九次到上杭的革命实践	福建上杭县博物馆 雷晓华 (104)
毛泽东七上东固史实考证	
——兼述毛泽东在青原革命活动历程	东固革命根据地 丁仁祥 (109)



毛泽东成为军队统帅之始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黄 洋 (119)
毛泽东 1927 年在武汉	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 张 彦 (127)
毛泽东写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标题的由来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张 艳 饶道良 (132)
毛泽东在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战斗足迹	东固革命根据地 (136)
文化：上海毛泽东旧居建设的重要元素上海毛泽东旧居	杨继光 (140)
电视剧《恰同学少年》的当代德育教育意蕴	刘立勇 朱与墨 (143)
武昌农讲所、武昌毛泽东旧居	(151)
新民学会——建党先声	(153)
从清水塘毛泽东杨开慧故居看名人故居旅游营销	清水塘毛泽东杨开慧故居 周 渡 钟上林 (163)
平凡的毛泽东	长沙党史研究会 李 李 刘 莹 (175)
追寻伟人的历史足迹 ——试析《沁园春·长沙》的时代背景.....	李历松 谭双山 (185)
走近毛泽东 ——试论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人格风范	李 强 (197)
红色大印的追忆 ——中华苏维埃兴国县城冈区执行委员会大印追记	雷晓娟 李 李 (218)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王向清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一是井冈山时期的准备阶段，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名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了理论上的准备。二是延安时期的系统化阶段，《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名著，从认识论、唯物辩证法、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等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建构了系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三是建国初期的充实、完善阶段，这一时期，毛泽东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探讨了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领域，充实、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中国的实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其二是按指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去建构反映时代精神的新的哲学体系，并使这种哲学体系具有中国特色和气派，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那天起，就存在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没有毛泽东的创造性贡献，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本文探讨的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包含了哪些主要阶段。笔者认为，这一历史进程包括了三个阶段：即



井冈山时期的准备阶段，延安时期的系统化阶段，建国初期的充实、完善阶段。

一、井冈山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准备阶段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等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了初步探索。

1930年初，由于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向忠发缺乏领导能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实际上主持了中央的工作。李立三推行了系统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指令毛泽东和红四军立即放弃分散武装农民的策略，集中红军作好攻打大城市的准备。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苏区出现了一股脱离中国实际，动辄照搬马列主义“本本”和苏联革命的经验建设根据地的倾向。为驳斥“左”倾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于1930年5月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本本主义也就是教条主义，“惟书”和“惟上”是它的两个显著特点，即认为书上说了的就是对的，上级说了的就是对的，就应当照办。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惟书”、“惟上”的教条主义对革命事业是极其有害的。他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①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不能照搬苏联革命的模式和经验。

为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口号。他断言，“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②正是基于对调查研究重要性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③。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看来，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先认识个别，然后上升到一般。而调查就是从考察个别对象开始，在获得大量感

性材料的基础上，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综合、概括出一般性的结论来。因此，调查是了解情况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不但在理论上提倡调查研究，而且也是这样践行的。早在1921年冬，为推动工人运动，作为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的毛泽东就深入安源路矿进行调查研究。通过调查，掌握了工人们的悲惨境遇，为工人们摆脱剥削、压迫指明了途径。在大革命时期，为回击国民党右派和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者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毛泽东于1926年1月4日至2月5日实地调查、考察了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5县的农民革命运动，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农民革命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的结论，推动了农民革命运动向前发展。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为探索如何进行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毛泽东先后对江西的长冈乡、寻乌县、福建上杭县的才溪乡进行了调查，分别写出了《长冈乡调查》、《寻乌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著名的调查报告；而《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就是在寻乌调查的过程中写成的。正因为毛泽东注重调查，通过调查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才逐渐形成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才形成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粉碎强大敌军围剿弱小红军，并取得胜利的军事原则。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两个命题以朦胧的形式表达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这种联系就是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来实现的。理论只有与实际相结合，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必须反对本本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原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因而，这两个命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原理。这一原理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含义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中国的实际，使其能够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鉴于《反对本本主义》中并没有出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等清晰的命题，因而笔者认为它只是体现了第一层含义上马克思主



义哲学中国化的精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还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这些文章都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精神，同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要求。

二、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系统化阶段

延安时期，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名著，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推进到系统化阶段。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时代不同，哲学关注的中心不同。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心问题而引发出的政治思想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中国近代哲学对知行观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作为忧国忧民的先进知识分子，毛泽东一生都在为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而上下求索，自然会重视认识论的考察，以形成指导革命实践活动的理论。《实践论》就是这种考察的结晶。

《实践论》继承、发扬了列宁提出的实践第一的观点，强调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在毛泽东看来，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体现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判定人们的认识是否是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毛泽东以实践第一的观点为基础，将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作为认识论的有机环节系统地贯穿起来，对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作了系统而完备的阐发，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为实践的认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毛泽东是第一位对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做了如此完备阐述的经典作家，促进了中国哲学关注的重心由本体论到实践的认识论的转换。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李达既强调了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又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化的倾向。以此为基础，毛泽东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重点由本体论转向实践的认识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实践论》扬弃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中国

气派。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知和行的关系问题。《实践论》则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深刻地阐明了认识源于实践又为实践检验的思想。虽然这一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学说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其中也确实包含了知行统一、行先知后等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观的合理内容，是对传统知行观的扬弃。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作为《实践论》的副标题。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范畴的提出是毛泽东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另一标志。“《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既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也概括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因而，它集中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统一。”^④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上首次把认识论和历史观结合起来，对心物之辨做出了科学的总结和回答。西方近代认识论的特点是与自然科学密切相关；中国古代哲学讨论心物之辨主要是天道观和认识论的论争，既没有也不可能讨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问题。而在中国近代，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社会历史观的问题突出了，它和认识论问题互相影响，历史观渗透到认识论中，认识论又渗透到历史观里，最后形成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范畴。因此，“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范畴。

其次，概括了中国化的唯物辩证法理论。

《矛盾论》系统、完整地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提出了新的唯物辩证法理论。《矛盾论》不但坚持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的观点，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⑤，是宇宙的最根本规律；而且从多层面完整、系统地阐发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可以说，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史上，它提出了不少原创性的观点，首次赋予对立统一规律以完备的理论形态。《矛盾论》对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依据一定的条件相互转化的论述就具有原创性；借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去阐发或引申对立统一规律原理是《矛盾论》的显著特征，这使得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和气派，是地道的中国化唯物辩证法理论。

再次，提炼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纲领、党的路线、夺取政权的方式，取得政权后的国体、政体等方面的理论。

延安时期，毛泽东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对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道路、领导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等政治哲学的问题给出了富有新意的创造性解答，集中体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新民主主义”这一新范畴的提出是毛泽东提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主要标志。1940 年 1 月，毛泽东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这一范畴。在毛泽东看来，1917 年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区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小阶段。“十月革命”前的中国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因而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革命的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十月革命”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则成了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转变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则是革命力量，革命的目标是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概括形成的“新民主主义”范畴对“十月革命”以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领导阶级、革命目标提出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见解，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的独创，它的提出，为无产阶级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正当性、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对“国体”、“政体”的内涵的界定是毛泽东提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的又一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国体”和“政体”这对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的含义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中国的学术界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以前对它们也不甚了了。毛泽东通过自己的思考，对“国体”和“政体”两个范畴的涵义给予了界定。他认为国体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体指的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⑥。他主张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应当是几个阶级的联合专政，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体应采取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作为政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不同于巴黎公社的政体形式，也不同于苏维埃的政体形式，

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设计的国体和政体形式。

1945年4月,毛泽东撰写了《论联合政府》一文,充实、完善了“国体”、“政体”的内涵。在他看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是“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这种国家制度既满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又满足了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阶级的利益,还兼顾了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利益,因而是最适宜的国体。最明显的完善之处是将领导阶级由“无产阶级”改为“工人阶级”,也就是说,领导阶级的外延缩小了,原来作为领导阶级的雇佣农民已排除出去。《论联合政府》把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政体充实为既“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⑦。这使得民主集中制的含义更加明确。

“国体”、“政体”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核心范畴,毛泽东对二者涵义的界定,对中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应当采取的国体和政体的见解,既是理论上的创新,又给合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构成了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

最后,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

军事哲学就是从哲学的高度反思军事实践的哲学。它揭示的是纷繁复杂的军事活动中所包含的一般本质和规律;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把握军事活动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是上升到哲学高度的军事活动的形而上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军事领域,科学地总结了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阶级进行战争的丰富经验,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同时,创立了无产阶级的军事哲学,主要体现在,阐述了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和方法论,揭示了军事对经济的依赖关系,提出了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基本理论。

列宁在领导俄国工人阶级革命和苏联人民抵御国际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充实、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在战争理论方面,揭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本质以及消灭的途径,进一步分析了战争、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在军队学说方面,进一步论述了军队的阶级本质和使命,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军队的必要性;在人民战争理论方面,提出了战争胜负决定于人民群众对待战争的态度和人民战争的基本理论;在武装起义理论方面,结合俄国的实际情况,论述了武装起义与暴力革命、战争的关系,阐述了武装起义的规律、前



提和条件。

如前所述，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主张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当然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的应用。正因为如此，延安时期，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的指导下，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文，丰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撰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第一次系统地对中国革命战争的原则性和规律性问题作了哲学反思，对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首先指出了应当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⑧针对当时的教条主义者认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的错误论调，毛泽东指出：“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之下获得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⑨这段文字清楚地表达了应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的思想，是毛泽东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的指导原则。在此原则指导下，毛泽东考察了战争的本质和规律性问题，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问题，然后深入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战略和战术。

如果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的开始，那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三篇文章的发表则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体系的形成。这些文章把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灵活地贯彻于其中，科学和全面地揭示了我国抗日战争的规律、原则和方法。从研究方法上看，毛泽东在军事哲学的探索上已经从抽象回到了具体，已经能够从相对抽象的一般性回到相对具体的一般性领域；从研究意义上看，毛泽东已经将从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中总结出的一般

性军事哲学，进一步运用于思考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特殊性领域，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运用它自觉自如地指导中国革命战争。

上述著作中，《论持久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的典范。《论持久战》完善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军事哲学思想，也概括地包含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延时期其他军事著作中的军事哲学思想，从一般原则同具体实践的结合上促使军事哲学的理论内容在整体上达到了理性具体的高度。第一，《论持久战》运用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理论探讨了军事实践活动的一般问题，诸如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军队和老百姓的关系，指出了政治对战争的制约作用，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口号，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中的人民战争思想。第二，这部著作将“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来研究，不仅科学地分析了这一战争的具体发展规律，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的一般原理进一步分析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辩证运动规律。因此它既是一部指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实践的指导性文件，又是一部全面、具体地阐述军事哲学原理的经典著作。第三，它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逻辑研究方法，构成了清晰、简洁的理论体系。第四，《论持久战》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军事认识论。从《论持久战》的逻辑结构来看，大体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回答“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主要解决对抗日战争的认识问题；第二部分回答“怎样进行持久战”、“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的问题，解决抗日战争的具体操作问题，即把正确的认识变成正确的实践方法，解决如何使主观见之于客观的问题。

不难看出，延安时期，毛泽东侧重的是第二个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许多领域提出了原创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构了系统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哲学创造，其目的不是为了建构纯粹的哲学理论，而是为了用这种哲学理论去解答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因而也体现了第一个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三、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充实、完善阶段

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毛泽东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目的是为了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而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对马



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索的目的则是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成功,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确立。如何借鉴苏联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成为毛泽东不得不探索的理论问题。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结晶,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领域,充实、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社会主义社会存不存在矛盾?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还有没有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没有探讨和回答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内部也没有统一认识。当时,党内还流行着一种说法:社会主义不存在矛盾,人民内部不存在矛盾。但事实表明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从苏共二十大到波匈事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我国个别地方少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等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这表明,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如何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作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从理论上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不是难事。但事实怎样呢?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毛泽东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这些汇报表明,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的确存在多种矛盾。为了妥善处理这些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毛泽东于1956年4月撰写了《论十大关系》一文。《论十大关系》一共讲了十个问题,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毛泽东指出:“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⑩。

《论十大关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实际情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率先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

盾，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论十大关系》不但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十大矛盾，而且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方法，这就是统筹兼顾。所谓统筹兼顾是指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要有全局观念，既突出重点，又照顾非重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举例来说，《论十大关系》在论述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时，一方面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另一方面又强调必须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论述沿海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时，一方面指出为了工业发展的布局必须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另一方面又强调要很好地利用沿海工业的基础；在论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时，一方面指出国防建设不可没有，另一方面又强调把军费降到一定的适当比例，以增加经济建设的费用；论述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强调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既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又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对其他几种矛盾关系，毛泽东也提出了以统筹兼顾的方法处理。而对这些矛盾关系统筹兼顾的目的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论十大关系》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矛盾关系的处理既坚持了以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的辩证思维，又是对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没有妥善处理各种关系而出现偏差的纠正。就拿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关系来说，重工业固然是重点，应优先考虑，重点保障，但如果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一方面重工业得不到足够农产品和轻工产品的供应，另一方面也会失去重要的销售市场，结果是重工业也发展不起来。这就是说，十大关系中的各关系承担者既有利益对立的一面，又有利益一致的一面，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因而不能只顾一方，无视另一方。《论十大关系》强调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种种矛盾要统筹兼顾也是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总结。由于历史的原因，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时，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导致农业、轻工业滞后，农产品、日用轻工产品匮乏；在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时，一味强调国防工业的建设，民用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严重妨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主张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各方面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因此，《论十大关系》中统筹兼顾方法的提出，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经验的总结、教训的反思，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存在种种矛盾，这些矛盾中有没有基本矛盾



呢？这些矛盾能不能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审视呢？为解答这些问题，毛泽东于1957年6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该文中，毛泽东从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原理出发，认为矛盾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但普遍存在，而且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当然，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具有对抗的性质，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节得到解决。除了基本矛盾以外，社会主义社会的其他种种矛盾用阶级分析来审视，不外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社会矛盾中的绝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全面剖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特点、表现形式和处理的方针原则，形成了一整套区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和方法。首先，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敌我之间的矛盾，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解决这种矛盾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其次，不同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的具体方针不同。

《论十大关系》自觉地在中国具体环境中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结合中国实际，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并使之带有中国特点，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社会矛盾的学说，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领域。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国际共运史上首次把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⑩事实上也是这样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就把民族资产阶级纳入人民的范畴，采取赎买的政策将他们的工商企业收归国有，